

相互威脅的安全—— 一九五〇年中蘇共安全合作的觀察

周 湘 華

(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生)

摘 要

本文擬從相互威脅的觀點，來觀察一九五〇年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由相互威脅的觀點，可以發現以往由意識型態與共同威脅發展出來的冷戰史觀，在一九五〇年的個案上，解釋力有限。而由相互威脅的觀點，對一九五〇年中蘇共的安全合作似乎更具解釋力。

關鍵字：相互威脅、安全合作、中蘇關係

* * *

一、前 言

一九五〇年「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標示著中蘇兩國安全合作的新里程碑。近代史學家在分析一九五〇年中蘇安全合作常認為有其歷史的必然性，特別是台灣研究國共內戰的學者更認為中共是共產國際的第五縱隊，由蘇聯一手扶植起來，這樣的論點有其時代背景的侷限性。冷戰結束後，隨著美俄兩國五〇年代外交檔案的解密，我們更發現這種論點的解釋力有限。筆者擬從新資料的觀察中，說明傳統解釋的侷限性，並試圖證明同盟間可能存在相互威脅的現象，進而呈現一九五〇年中蘇安全合作的原始面貌。

二、相互威脅的安全觀

國家安全是一個語意模糊的符號 (ambiguous symbol)，不易有明確的界定且具有多重的解釋^①。傳統現實主義者將國家安全奉為最高原則，並認為安全唯有靠權力

註①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47.

始能維護，即權力只有用權力始能抵制，任何國家若擁有足夠損害他國的力量皆不足以信任^②。國際體系論者則延續傳統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觀點，認為當任何一國權力急遽增長，體系內的國家會採取制衡的措施，即以聯盟的方式來抵制權力過大的國家或集團。瓦爾特（Stephen M. Walt）修正了權力平衡的結構必然性，提出了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理論，強調權力不等於威脅，國家的制衡行為應理解為面對威脅時的反應，即「被視為具有威脅性的國家，才是較有可能引起其他國家起而抗衡的主因」^③。國家在面對威脅時會採取制衡的手段，即與他國結盟以反對最主要的威脅；或採取追隨（bandwagon）的手段，即與危險的一方結盟或屈服於威脅^④。

施韋勒（Randall L. Schweller）認為國家在面臨威脅或他國權力的急遽增長時，並不總是採取制衡行為，從歷史上來看，追隨而非制衡才是比較常見的國家行為。不滿現狀的國家常常會追隨另一個正在崛起並試圖挑戰與改變現存國際秩序的國家，因為追隨挑戰者才有可能解除現狀對追隨者的限制，並分享建立新世界的果實。所以加入危險的一方並不等於綏靖，相反的是加入有可能獲勝的一方。加入一個挑戰現狀的國家或聯盟，正是不滿現狀國家的利益所在^⑤。

追隨危險的一方，即與強權結盟，通常是實力不足以制衡敵國，且面臨敵國威脅時，同盟國的援助又不確定之下，他們寧可選擇投入敵人的懷抱來換取敵國的善意回應^⑥。施羅德（Paul Schroeder）對盟國援助的不確定性有深入的說明，因為制衡大國的代價太高，大多數國家都不願意承擔，而寧願選擇其他代價較低的戰略，即躲避（hiding）。躲避的方法很多，諸如保持中立、請求爭執的雙方保證自身安全、奉行孤立政策、純防禦性立場以求躲過衝突的風暴^⑦。由於盟國的不確定過高，致使追隨危險的一方成爲一種理性選擇。

弱小的一方加入危險的一方，似乎是一種戰略投降。他又如何成爲危險一方的威脅呢？我們可以從瓦爾特對威脅因素的四項分析了解^⑧：

一、總體國力（aggregate power）：國家的整體資源如人口、軍備、工業與科技能力越強，越可能對他國造成威脅。

二、地理遠近（geographic proximity）：鄰近強權的威脅自然大於遠方的強權，若國力相當，國家會傾向與鄰近的國家結盟。

註② Inis L. Claude, Jr.,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pp. 42~51.

註③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59.

註④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 17.

註⑤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Summer 1994), pp. 79~81.

註⑥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p. 29~30.

註⑦ Paul Schroeder,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Summer 1994), pp. 116~117.

註⑧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pp. 21~26.

三、攻擊能力 (offensive power)：攻擊能力、總體國力與地理遠近有密切的關聯，但並不相等。攻擊能力是指在可接受的代價下，對另一國家的主權及領土的威脅能力。

四、侵略意圖 (aggressive intentions)：被視為具有侵略意圖的國家，自然容易造成其他國家的威脅，進而結盟以限制威脅的擴大。

弱小的國家加入危險的一方，自然與強國不具備同等的權力，也看不出立即與明顯的威脅。然而，弱小的一方若是具備威脅來源的四項潛能，儘管短期內無法與強國抗衡，但強國不可能不將其視為未來的威脅而加以控制。小國雖然在短期的實力上具有重大落差，但是威脅感的認知不會等到小國成長才加以擴大，就像流行已久的中國威脅論，他的威脅與能力仍然存在不小的落差。

同盟間存在安全的權利與義務，同樣地也存在對內對外的威脅與恐懼。本文擬由歷史研究的途徑來分析傳統中蘇同盟觀點，並試圖理解同盟內的相互威脅是否真實存在。

三、傳統分析的核心觀點

傳統解釋冷戰初期中蘇安全合作的核心觀點奠基在中蘇共同的意識型態與共同的威脅。從意識型態上來分析，中蘇共同信仰馬列主義的意識型態奠定了合作的基礎，而歷史事實的發展似乎也驗證的這種說法的可信度；再結合共同威脅的觀點，使得中蘇合作的必然性觀點牢不可破。特別是國際關係的理論驗證，如體系理論強調結構影響了國家的定位，國家身為國際體系的主要行為者，很難不遵從體系的結構因素來維護自身的安全。特別是冷戰初期嚴密兩極體系所強調的觀點，邊緣國家很難逃離兩大集團的影響而被迫選邊以維護自身的安全。而意識型態的相近，使得中共無可避免地選擇蘇聯為其安全合作對象。其次是聯盟理論的觀點，聯盟理論強調國家為維護自身安全，本諸權力平衡的觀點^⑨，採取聯盟手段以求得均勢遊戲中的權力優勢來維護安全，而聯盟理論最強的行為動機則是來自共同的威脅。因為共同的威脅使得國家願意放棄部份的國家目標來服從盟主國的意志以求得安全的保障。因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互視對方為主要敵人，因此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集團與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集團勢必對抗，而中共在美國的威脅下，必須尋求同一集團蘇聯的合作才能對抗美國的威脅。

這樣的觀點配合歷史事實表象的近似，形成了外交政治的絕佳宣傳，我們可以把它稱為冷戰史觀。這種冷戰史觀造成史家在分析中蘇關係時，常循著兩個主觀的認知簡化了中蘇合作可能的真實情況：一是因為中蘇共意識型態相近，再加上美國對兩國的共同威脅，促成雙方合作；二是因為中美意識型態不同，再加上美國威脅中共，所以雙方對抗。

註⑨ Inis L.Claude, Jr.就說：「以均勢為原則的權力平衡缺點是不能提供國家免受攻擊的安全感，但有一個優點即是不讓國家在追求安全的過程中處於絕對劣勢。」in Inis L.Claude, Jr.,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66.

意識型態與共同威脅這兩個核心觀點，幾乎主宰了整個冷戰時期的歷史觀察。筆者並不試圖推翻冷戰史觀的解釋，只想證明這種解釋力有限，並試圖從相關資料中，提出冷戰初期中蘇合作的另一種觀察，補充這一段歷史的解釋。本文的分析中首先將挑戰美國是中蘇共同威脅的觀點，其次質疑蘇聯係中共最重要支持者的角色及中共對蘇聯的觀感，最後從「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談判過程了解雙方合作的真實動機。

四、美國是中蘇共同的威脅？

從同盟理論的觀點分析，國家面臨共同的威脅會促成國家間的聯盟，所以在解釋冷戰初期中蘇共的合作，常運用同盟理論的觀點來加以解釋。但是冷戰初期，美國真的執行一種與中共敵對的政策嗎？而中共在冷戰初期也執行與美國敵對的手段嗎？筆者將從這兩個面向來分析，冷戰初期共同威脅的觀點可能不具足夠的解釋力。

(一) 美國意圖與中共為敵？

一般在分析冷戰時期中共的外交政策，儘管有許多時期的劃分，但很難不將焦點集中在美蘇兩國^⑩。特別是在一九五〇年代，中共親蘇反美的外交政策成為研究者難以動搖的印象，進而忽略杜魯門總統對華政策本質上的調整，杜魯門總統成為國共學者在政治上共同譴責對象，但其維護美國利益的努力卻刻意被忽視。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儘管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事件的陰影仍在，但基本上美國仍支持國民政府，並協助運送國民政府軍隊接管華北一帶的佔領區，而國共內戰的爆發，美國派遣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進行調停，但對國民政府仍予經濟援助，主要著眼點在於倘使放棄蔣介石將使中國陷入分裂以及蘇聯控制東北，這對美國遠東的重要利益受損^⑪。美國的調停的確給予中共發展的機會，壓迫國民政府接受與中共分享政權，保證了中共的生存，並且避免捲入國共衝突的區域，換言之是不與中共正面衝突^⑫，但是中共並不認為美國偏袒它，中共在內戰中逐漸佔上風^⑬，

註⑩ 對於中共冷戰時期的外交分類，學者們因基於不同的分析面向：如以美蘇外交為主，或以中共對國際秩序的看法等，而有不同的分類。如 Harry Harding 分成五個時期，Michel Oksenberg 分成三個時期，台灣學者尹慶耀分為四個時期，大陸學者張小明、李捷亦分為四個時期，謝益顯分五個時期，但斷限及名稱不盡相同。請參閱 Harry Harding,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oblem of Communism* vol. , no. (March/April, 1983), p. 2; 尹慶耀, **中共的統戰外交** (台北: 幼獅文化, 1984 年); 劉山、薛君度主編, **中國外交新論** (北京: 世界知識, 1997 年); 謝益顯主編, **中國當代外交史 1949~1995** (北京: 中國青年, 2000 年); Michel Oksenberg 著, Robert A. Pastor 編, 胡利平、楊韶琴譯, 「中國: 走向世界舞台的曲折道路」, 在 **世紀之旅: 七大國百年外交風雲 (A Century's Journey: How the Great Powers Shape the World)**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頁 330~334。

註⑪ 戴萬欽, **中國由一統到分割—美國杜魯門政府之對策** (台北: 時英出版社, 2000 年), 頁 49。

註⑫ 例如美國的煙台登陸行動, 在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共軍退出, 但是在朱德的抗議與警告下, 反而取消登陸, 顯見美國避免與中共衝突的意圖。許湘濤, 「戰後初期之中蘇關係 (1945 年 8 月至 1946 年 8 月)」, 張玉法主編, **中國現代史論集** (第十輯) (台北: 聯經出版社, 1982 年), 頁 400~401。

也使美國陷入抉擇的困境^⑭。

一九四九年一月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34/1 文件即指出，美國要預防任何可能支配中國的外國強權出現，立即而明顯的目標是預防中國成為蘇聯的附庸^⑮。儘管早期採取援助意識型態較近的國民政府，但在國共內戰局勢反轉時，美國開始改變對華政策^⑯，NSC34/1 文件即指出美國將避免對中國境內的任何派系或在任何行動中做出不可挽回的承諾（irrevocable commitments），並將維持彈性的政策^⑰。同年三月三日，杜魯門總統正式批准國家安全會議 NSC34/2 號文件^⑱，美國逐步從軍事、經濟等方面放棄對國民政府的支持，並嘗試與中共建立關係^⑲。首先美國保留駐瀋陽、北平、上海等中共統治地區的領事館，並與各地中共單位接觸運作，顯示美國常駐大陸的決心，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在中共佔領南京時仍留駐南京，顯示美國願意與中共建立良好關係。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發給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訓令中表示，美國原則上不把承認中國當作一項政治武器，只要這個國家能夠控制大部分領土與國家機構，為維持公共秩序，有能力履行國際義務，統治權為人民普遍默認，美國便可承認這個國家^⑳。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宣佈了向蘇聯

註⑭ John King Fairbank 形容國民黨軍隊不受文職人員管制，黃埔嫡系又歧視地方將領，戰略上緊守城市據點，貪污腐敗；反之中共軍隊在農村迂迴，從民衆中補充兵員，組織窮人對抗富人，破壞交通，不打沒把握的戰，導致力量對比的反轉。John King Fairbank 著，張理京譯，*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北京：世界知識，2001年），頁328~329。

註⑮ 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國務院政策計劃局（Policy Planning Staff）提出 PPS39 號備忘錄指出美國因為反蘇戰略的需要而支持蔣介石，這一政策雖然可以理解，但不是好的外交，它使美國無從選擇，援助國民政府不可能扭轉戰局，美國要從政治、軍事和經濟中掙脫出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vol. 8 (1948);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pp. 146~155.

註⑯ *FRUS*, vol. 9 (1949), pp. 474~475.

註⑰ William W. Stueck, Jr. 就認為倘使美國持續採取與中共對立政策會遭遇四項困難：一、西方盟國是否步驟一致；二、革命性政權面對封鎖的生存能力強，特別是中國相當程度的自給自足與低度消費，容易抵銷對立的壓力；三、對立會立即而明顯損害美國在華的投資利益；四、對立會促使中共消滅內部歧見，更加導向蘇聯。William Whitney Stueck, Jr.,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 1947-1950*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pp. 120~121.

註⑱ *FRUS*, vol. 9 (1949), p. 475.

註⑲ NSC34/2 號文件指出，中共已成爲中國支配性的力量，國民黨政府可能可以殘存一段時間，但不比南斯拉夫保皇黨能有所作爲，因此美國援蔣或支持中國其他反共力量都是不智之舉。*FRUS*, vol. 9 (1949), pp. 491~495.

註⑳ 美國對一九四八年援華法案通過的 6000 萬軍援物資採取拖延啓運的方式，對於李宗仁代理總統美國也不發表支持態度，對於南京政府遷移廣州，美國駐華大使也不遷移，最後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國政府發表了 1054 頁的中國白皮書，說明一九四四~一九四九年間美國對華政策，並表示國民政府的垮台歸諸於自身腐敗的因素。林利民，*遏制中國——朝鮮戰爭與中美關係*（北京：時事出版社，2000年），頁29~37。

註㉑ *FRUS*, vol. 9 (1949), p. 22.

「一邊倒」的外交政策^①，美國仍然沒有放棄與中共改善關係的期待，同年八月美國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特別是一九四四～一九四九年時期》（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的白皮書，正式宣告與蔣介石政權劃清界線，等待中共勝利的「放手政策」（offhands policy）^②，美國的舉動明確地表達對中共的善意，它不期望中共能在短期內傾向美國，但希望中共能扮演一個中立的角色，或至少不完全倒向蘇聯的遠東國家。

從權力的角度來看，美國對中共有權力的需求，或至少不希望中共將其權力的砝碼加在蘇聯，故不斷地釋出善意來獲得中共的信任，在期望效應的觀點上，美國希望藉由國家間的信任行為來引導中共達到美國的角色期待，從權力與信任兩個概念所希望引導的合作，看不出美國有威脅中共的意願。

由此可見，在一九五〇年二月中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前，美國並沒有採取敵視中共的政策，甚至在中蘇條約簽訂後，美國也沒有採取立即的敵對行動，一直到韓戰爆發，杜魯門的「六二七聲明」，派遣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美國防禦性的對抗政策才開始產生。所以冷戰初期，美國威脅中共的立論是存有疑義的。

（二）中共視美國為敵人嗎？

當然在觀察威脅的角色時，我們不能片面地以為美國不威脅中共就認為中共沒有美國的威脅。威脅認知是主觀的心理層面問題，中共是否認為美國是一個重要的威脅，我們必須從中共與美國接觸的經驗中尋找，特別是中共是如何看待美國的。

一九三五年以前，中共認為美國與日本一樣，是協助侵略中國的幫兇，這些印象源自於共產國際、當時黨內領導人左傾思想與國共對抗的歷史背景；但是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重新確認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班子，同年十二月瓦窯堡會議，中共將美國與日本重新區隔，對於反日的國家進行必要的諒解；一九三六年斯諾（Edgar Snow）訪問毛澤東，毛澤東第一次正面評價美國並確認其在東亞的重要地位，一九四一年中共對美國的宣傳上不再採用帝國主義字眼而改以友邦，一九四四年中共對美國的良好形象達到最高點，特別是同年七月美國軍事觀察團訪問延安，中共首次與美國建立準官方關係^③。

註① 毛澤東在本文談到：「『你們一邊倒』正是這樣。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http://www.mzdthought.com/mxxx.htm>（21 Dec 2001）。

註② 肖元愷，百年之結—美國與中國台灣地區關係的歷史透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24。該書將白皮書發表時間誤植為10月，正確日期為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白皮書名稱亦有錯誤，請參閱林孟熹，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頁190或「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選集第四卷，<http://www.mzdthought.com/mxxx.htm>（21 Dec 2001），*FRUS*, vol. 9 (1949), p. 1392.

註③ 楊玉經，中國人的美國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70~182。

一九四四年七月，美國派遣 10 餘人的軍事觀察團赴延安考察，受到毛澤東熱情接待，並表明無論戰時及戰後都樂意與美國全面合作^②。赫爾利的來訪，毛澤東更表達^③：

中國不能只和一個強國或者一群強國發生友善的關係，無論依賴蘇聯而冷淡英美，或者只依靠美國而對蘇聯表示仇視、懷疑都是錯誤的。

一九四五年一月，毛澤東向美國軍事觀察團表達訪美的意願^④，同年在重慶談判時亦表明與美國合作的態度^⑤，一九四六年朱德在延安歡迎馬歇爾的群眾大會上亦表達與美、蘇、英合作的態度^⑥。但是由於大戰結束後，美國持續將租借法案的軍火提供給國民政府，引發了中共對美國的批評^⑦，這樣的批評損害中共與美國的關係，但似乎還不到反目成仇的地步。

一九四九初，毛澤東在與蘇聯密使米高揚（Anastas Mikoyan）會談有關新政府承認問題，米高揚表示毛澤東除了希望蘇聯的立即承認外，對於外國政府有意承認也不排斥^⑧。解放軍渡江後，毛澤東仍指示如果美國及英國能斷絕和國民黨的關係，可以考慮和它們建立外交關係^⑨。此時中共在國共內戰中已無實力不足的問題，而美國的塵埃落定政策也使中共無須擔心國民政府與美國的關係是否會影響其統一政策，顯示中共沒有排拒與美國合作的可能，或至少不立即敵對的狀態。同年解放軍攻陷南京前夕，中共駐南京軍管會外事處主任黃華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取得聯繫^⑩，更顯示中共重新探索與美國的新關係。

註② 林利民，*遏制中國—朝鮮戰爭與中美關係*，頁 38。

註③ 徐曉天、李春隆、徐振澤著，*新中國與蘇聯的高層往來*（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42。

註④ 同前註。

註⑤ 毛澤東回答路透社記者表明未來自由民主的中國將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轉引自謝益顯，*解放日報*，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第 33 版。

註⑥ 朱德說：「…加上中美的團結與美蘇英中各大國的團結…中國一定能夠實現和平民主統一…中國一定能夠與美國、蘇聯、英國和其他友邦親密團結鞏固遠東的和平和世界的和平。」轉引自謝益顯，*解放日報*，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第 33 版。

註⑦ 馬歇爾使華報告便詳述中共對於馬歇爾調停時期，循環性對美國時好時壞的攻擊。梁敬鎔譯，*馬歇爾使華報告書簽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年），頁 588~607。

註⑧ 參閱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二日，米高揚提交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報告，「米高揚就 1949 年 1~2 月的中國之行向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提交的報告」，*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3，目錄：65，案卷：606，頁 1~17。轉引自 A. M. 列多夫斯基，陳春華、劉存寬譯，*斯大林與中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年），頁 69。

註⑨ 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致鄧小平、劉伯承、陳毅等電報，*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頁 83。

註⑩ 有關中共與司徒雷登接觸之事，中外學者說法不一，林利民認為係司徒雷登秘書傅溼波主動接觸，林孟熹與傅溼波訪談紀錄說明黃華主動來電致意，一九七二年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發表一份「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的美國及共產黨中國：關於恢復邦交和承認問題」，J. Fulbright 說明了中美之間的接觸與中共放棄美國結盟。請參閱林利民，*遏制中國—朝鮮戰爭與中美關係*，頁 54；林孟熹，*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頁 118~129。

一九四九年中共在佔領區內對美國的僑民採取保護政策，對美國的教會、醫院、學校也謹慎對待，不急於接管。中共的高級領導人也經常與美國駐華官員接觸，其中以瀋陽、北平、南京、上海雙方的官員接觸特別引人注目。中共在政治上要求美國與國民黨斷絕關係並撤出在中國的武力，在經濟上不僅與社會主義國家做生意，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同年中國對美國貿易第一次出現近 2000 萬美元的順差^③，顯示中共並未忽視與美國打交道所獲得的政經利益，特別是英美兩國在中共建國初期佔所有外資的 89%，而一九五〇年中共同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總額已經超過了抗日戰爭前一九三六年的總額^④。更何況毛澤東曾表示中國戰後最需要是發展經濟，美國不僅是幫助中國發展經濟的唯一最合適的國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參與中國經濟建設的唯一國家^⑤。由此觀之，中共對美國也存在著權力的需求，甚至是依賴，由於國家權力嚴重的不足而不敢賦予美國過多的信任，以免危及自身的安全。但是在雙方互動的賽局中合作多於對抗，顯示中美雙方都了解合作可以產生共同利益，所以在許多分割的賽局中尋求足夠的信任感。在兩方持續展現善意的外交舉動，難以看出中共已經確認美國是其生存的主要威脅。

相對於蘇聯而言，二次大戰結束後蘇聯在佔領區迅速地扶植共產政權，甚至在德國整合上與美英法分道揚鑣，形成了柏林危機的準軍事對抗狀態，說明了美蘇兩大集團權力的直接對抗，使雙方均認為對手為其主要的威脅。相較於中共而言，它並沒有像蘇聯被美國圍堵的明顯危機感，美國反而配合其統一政策而不予阻撓，變相地承認中共在中國的合法性權力，兩相比較可以證明，冷戰初期蘇共並沒有共同的威脅，或至少中共對美國的威脅認知並未如同蘇聯一樣，足以迫使中共急欲簽訂軍事同盟來保障自身安全。所以用共同威脅的觀點來檢視中蘇條約的簽訂是有所不足的。

五、中蘇共的歷史友誼？

冷戰史觀在論述中蘇關係時，常常強調意識型態促成合作的必然性，並強調蘇聯對中共的幕後支持，是中共在國共內戰中得以勝出的決定性因素。筆者將從意識型態的必然性、蘇聯對中共的支持程度與中共對蘇聯的觀感來討論中蘇之間歷史友誼的份量。

(一) 意識型態的必然性

意識型態促成社會主義國家間的合作是一個重要的背景因素，但不具有必然性。我們檢視蘇聯在戰後籌組的國際共產情報局，參與的九個國家：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北韓、捷克、波蘭、蒙古、東德、阿爾巴尼亞等國家全都是在蘇聯的軍事扶

註③ 林利民，*遏制中國—朝鮮戰爭與中美關係*，頁 93~94。

註④ 對外貿易部編，*對外貿易論文選集*（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55年），轉引自孫健，*中國經濟通史*（下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 1472、1474。

註⑤ John S. Service，王益等譯，*美國對華政策*（The American Papers: Som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US-China Relations）（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89年），頁 231。

持下所成立的共產國家，但是由狄托（Tito）所領導的南斯拉夫共黨卻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二～二十八日的共產情報局會議中被列舉五大罪狀，並由共產情報局通過「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決議」，譴責南斯拉夫採取民族主義路線，將與各國共產黨立於相對立的地位^⑤，由此可見意識型態也未能超越民族國家的界線。

此外，中共是否為蘇聯心目中理想的共產黨呢？國共內戰時期，中共對美國表達的善意，甚至在統治區內對於帝國主義的資產都沒有立即的處理，甚至於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報告中，暗示容許帝國主義的經濟事業與文化事業在大都市地區存在^⑥。種種的現象均不符合十月革命後蘇聯的做法，中共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土地改革者或反殖民族主義者？其實蘇聯也保持懷疑的態度，史達林就曾經表示中共是冒牌的共產黨^⑦。一九四九年中蘇開啓了高層互訪，史達林便急切地想要了解毛澤東的意識型態，甚至要求毛澤東將其中國革命成功的理論匯集成冊，由此可見雙方在意識型態上是存在一定差異。

「工人無祖國」的口號下，毛澤東的領導色彩備受蘇聯質疑。首先，毛澤東是以農民革命起家成功的，他並不是無產階級份子，也並不依靠蘇聯的扶持，在黨內親蘇派王明等的鬥爭下，毛澤東也並未屈從，使史達林懷疑毛澤東是狄托主義的民族主義份子^⑧。一九四五年史達林曾要求毛澤東參與聯合政府避免國共內戰，但是毛澤東並沒有完全依照蘇聯的指示；一九四九年當中共攫取了長江以北準備南渡之際，蘇聯要求中共隔江自治，中共也沒有遵照指示，顯示中共的自主性^⑨。更有趣的是一九四九

註⑤ 方連慶、劉金質、王炳元主編，*戰後國際關係史（1945-1995）*，上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09～110。

註⑥ 毛澤東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全體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報告：「…由於中國經濟現在還處在落後狀態，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於國民經濟有害而是於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http://www.mzsdthought.com/mxxx.htm>（21 Dec 2001），John K. Fairbank 也有相同的看法，請參閱 J. K. Fairbank & R. Macfarquhar 主編，王建朗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280。

註⑦ 一九四四年史達林在會見美國駐蘇聯大使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時即說中共並非是真正的共產黨，它們是冒牌的共產黨。江英，「五〇年代毛澤東外交思想論述」，姜長斌、Robert Ross 主編，*從對峙走向和緩*（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頁575。

註⑧ 同前註。

註⑨ 謝益顯，頁34。有關史達林是否有要求毛澤東隔江自治其實研究者有兩派不同說法，認為有的引據毛澤東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下旬在西柏坡說：「國際上有的朋友，對我們解放戰爭的勝利也半信半疑，勸阻我們就此止步，和蔣介石以長江為界，搞南北朝」，這邊的國際朋友並未說明指何國，但是根據王方名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與毛澤東的會談回憶表示毛說：「直到一九四九年，我們眼看就要過長江的時候，還有人阻止，據說千萬不能過長江，過了，就會引起美國出兵，中國就可能出現南北朝。…我們沒有聽他們的。…後來我會見了阻止我們過長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話就說：『您們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而勝利者是不應該受責備的。』」這裡阻止的人指明史達林。反對史達林曾說過阻止渡江的理由，引據西柏坡會談的翻譯官師哲回憶錄的說法，他不曾聽到米高揚轉達史達林有這個意思，另外是俄羅斯總統檔案館解密資料尚未發現相關記載。相關資料請參閱袁南生，*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下冊）*（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793～794；王名方，「要實事求是，獨立思考—回憶毛主席1957年的一次親切談話」，*人民日報*，1979年1月2日；徐曉天、李春隆、徐振澤著，*新中國與蘇聯的高層往來*，頁16～20。

年，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高崗曾向史達林打小報告，說毛澤東與周恩來都是親美的^④，反映了蘇聯對中共可能的疑懼。

(二) 蘇聯支持中共？

一九四九年聯合國第四屆大會，國民政府提交一份指控蘇聯的訴狀，名稱爲「因蘇聯違反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和蘇聯違反聯合國憲章而對中國的政治獨立和不受侵犯以及遠東和平造成的威脅」，文件中指出蘇聯的三大罪狀：一是對中國政府軍及時進入東北並建立中央政府的地方政權設置障礙；二是撤軍時將東北交給中國共產黨，爲後者打開了一條從華北自由進入東北的通道，幫助中國共產黨在那裡建立強大的武裝力量，把蘇聯在近百萬日本關東軍投降時繳來的全部武器和軍事技術悉數轉給了中國共產黨；三是蘇聯政府背著中國中央政府同東北當局秘密簽訂了一系列向中共提供物質技術和其他援助的協議與合同^⑤。上述的說詞被認爲是國民黨喪失大陸的決定性因素，也被認爲是蘇聯支持中共的重要證據。但是蘇聯真的支持中共嗎？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蘇聯派軍佔領東北至一九四六年四月底撤軍，成立了民主聯軍，並提供大量關東軍的軍事物資與裝備，一般認爲這是蘇聯援助中共重要的證據。但是蘇聯若是真心要援助中共，何以在一九四七年春、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七月四日、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四次提出密訪蘇聯尋求援助，均遭到蘇聯的拒絕^⑥。這種現象說明了史達林對中共的援助是有疑慮的。站在無產階級革命的角度，史達林應該樂見中共革命的成功，但是站在蘇聯國家利益的觀點，國民政府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所讓渡的利益顯然遠比中共所能提供的來得大。這種現象造成了二次大戰後蘇聯政策的搖擺，蘇聯重視與國民政府的關係，但是除了在東北轉移關東軍裝備外，其他的援助是斷斷續續又不積極的^⑦。大陸學者認爲造成這種情況的理由有三：一是蘇聯認爲國民政府對他的安全沒有威脅，而這一點對他集中精力應付歐洲日趨緊張的對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二是史達林不願意看到南京政府完全投靠美國，他認爲與國民黨政府維持某種關係是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干擾和遏制；三是史達林對戰後中國兩

註④ 華慶昭，*從雅爾塔到板門店—美國與中、蘇、英：1945-195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2年），頁189。

註⑤ A. M.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與中國*，頁49～50。

註⑥ 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39，目錄：1，案卷：31，40～44。轉引自A. M.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與中國*，頁51～55；或參閱徐曉天、李春隆、徐振澤著，*新中國與蘇聯的高層往來*，頁24～28。

註⑦ 這種援助情況我們可以從米高揚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發給史達林的電報中了解：「周恩來說，我們十分缺乏反坦克炮，…我們的坦克也不行，…我們的原料不足，想從蘇聯獲得製造砲彈的炸藥。我們還請蘇聯派專家和提供製造武器的設備，…我回答說，我們原則上同意在組織武器生產方面提供幫助並派遣顧問，但對高射炮和反坦克炮問題我沒有表態，將報告莫斯科進行研究。」，由此可見一九四九年蘇聯的援助尚且如此，更何況時一九四九年以前。請參閱尤·米·加列諾維奇，*斯大林與毛澤東*（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頁162。轉引自徐曉天、李春隆、徐振澤著，*新中國與蘇聯的高層往來*，頁11。

種力量的對比看得不清楚，他不認為共產黨有在較短的時間內統一中國的力量^⑤。由此看來，關東軍裝備的移轉只是保障中共在戰後的生存，特別是在東北保留共黨第五縱隊的存在，有助於蘇聯在東北壓迫國民政府讓步。此外，二戰結束後，美國接管日本南韓，帝國主義武力已經到達蘇聯邊境的前沿，而國民政府親美的態度，讓蘇聯擔心國民政府在東北搞門戶開放政策，使得美國勢力得以進入東北，倘使讓國民政府接管東北，還不如讓中共接管東北來保障蘇聯在東亞的戰略利益^⑥。

其次，蘇聯對東北當局提供的技術協助與合同係於一九四九年七月簽訂。儘管中共尚未建國但大勢已明，以劉少奇為主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密訪莫斯科，最後卻是由高崗的東北人民政府簽訂諸多協議，顯示蘇聯只是進一步鞏固其在東北的利益，儘管史達林的理由是中共尚未正式建國，所以由地方政府簽約，但是主要的技術專家援助都集中在東北。

倘使我們由國民政府控訴蘇聯的證據來觀察，只說明了蘇聯在國共內戰甚至是戰後的核心利益均鎖定在東北，而非中共。整個二次大戰後，蘇聯均未對中共中央提供大規模的援助，一直到「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這個現象才有改變。這樣的觀點反映在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與羅斯（Robert S. Ross）所著的長城與空城計一書^⑦：

一九二〇年代的國民革命中，莫斯科充當了主要的角色。一九三〇年代後期，蘇聯成為國民黨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的主要外國支持者，……中共與史達林政府的關係從來沒有密切過。史達林支持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對手，直到毛執掌中共大權為止，然後又與反毛的一個布爾什維克派保持聯繫。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在中共與國民黨爭奪東北工業基地的戰鬥中，只是斷斷續續地給中共以援助，雖然這種援助在中共試圖立足東北的奮戰中至為關鍵。

此外，史達林遲至一九四二年才派遣了軍醫奧爾洛夫·安得烈·雅科弗列夫少將成為史達林與毛澤東私人的秘密聯絡管道^⑧，但是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初，史達林才派遣第一位高層特使米高揚密訪中共，開啓了中蘇之間高層的交流。就這樣的角度來觀察，中蘇共之間的友誼可能是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勝出之後才逐漸形成的。

（三）中共對蘇聯的觀感

在中共眼裡，蘇聯是一個值得信賴的老大哥嗎？自中共建黨以來，中共首先被蘇聯要求加入國民黨，開始了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政策，然而在北伐即將成功之際，蔣介

註⑤ 徐曉天、李春隆、徐振澤著，*新中國與蘇聯的高層往來*，頁31。

註⑥ A. M.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與中國*，頁167。

註⑦ Andrew J. Nathan & Robert S. Ross 著，何大明譯，*長城與空城計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頁86~87。

註⑧ 蘇聯於一九四二年一月派遣奧爾洛夫·安得烈·雅科弗列夫少將，作為毛澤東及其家屬的醫生，並透過莫斯科提供的電台成為毛澤東與史達林之間的秘密聯繫管道。請參閱徐曉天、李春隆、徐振澤著，*新中國與蘇聯的高層往來*，頁25。

石的清黨運動使中共正式與國民黨決裂，進行城市暴動的革命，反遭國民政府的圍剿，這種痛苦的經驗反映在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史達林的三七評價^④：

史達林整過我們四次：一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是史達林在莫斯科決定的；二是抗日戰爭初期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叫做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就是聽蔣介石的，這也是史達林在莫斯科決定的；三是抗日結束初期，……莫斯科來電要求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打內戰，……我沒聽他的；四是訪問莫斯科時，……整整呆了兩個月實在不好受。

蘇聯對中共「友好」的經驗也深刻地反映在中共元老胡喬木的回憶錄上^⑤：

我們歷來說，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但為輔的外援究竟在哪裡呢？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對美國的希望那麼殷切，反映出我黨和蘇聯關係雖然經歷的時間那麼久，但蘇聯始終對我黨關係冷淡。蘇聯始終沒有什麼真刀真槍的援助。……就是在皖南事變^⑥時，蘇聯的反應亦不如美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背景。

對國民政府大量的援助與對中共的杯水車薪，使中共在史達林的壓迫下，開始尋求與美國發展關係^⑦。既然中蘇共友好合作的歷史並不輝煌，那麼運用歷史背景來解釋中蘇合作的理由就牽強了些，因為以美蘇對中共的友善度而言，美國可能還高於蘇聯^⑧。

一九四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卡伯特（John Cabot）回報國務院的報告中適度地說明了中蘇共之間真實的關係^⑨：

一、一九四五年蘇聯與國民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出賣了中共；

二、蘇聯大使館是唯一遷往廣州的駐外大使館；

三、蘇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抱病會見離任回華出任外交部長的國民政府駐蘇大使傅秉常；

註④ 請參閱吳冷西，*十年論戰*（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頁13。

註⑤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89。

註⑥ 皖南事變即新四軍事件，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國民政府要求項英所領導的新四軍北調納入第十八集團軍，以黃河以北為作戰區域，但項英未服從指令反而攻擊國軍第四十師，反遭擊潰，國民政府宣佈解散新四軍以整飭軍紀，遭中共強烈反彈，並於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在蘇北重新成立新四軍。關中，「戰時國共商談」，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十輯*（台北：聯經出版社，1985年），頁254~256。

註⑦ 徐曉天、李春隆、徐振澤著，*新中國與蘇聯的高層往來*，頁34~35。

註⑧ 一九四四年之前中共是從意識型態的想像來對抗美國，但一九四一年美國參戰後，中共因需要在宣傳中與美國友善，但一九四四~一九五〇年雙方正式實際接觸，美國除了礙於承認國民政府外，大部分的時間對中共都是友善的。

註⑨ *FRUS*, vol. 8 (1949), p. 356.

- 四、與即將垮台的國民政府簽訂新疆協定；
- 五、蘇聯不肯援助中共與希共形成對比；
- 六、驅逐讚揚中共的美國記者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 七、五一莫斯科遊行並未表彰中共英雄；
- 八、蘇聯關閉北平、上海領事館。

這些事件看在中共的眼裡，很難相信中共對蘇聯的信賴會比美國高，而中蘇在冷戰初期也不具備友好的合作環境。那麼是什麼原因讓中蘇共願意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呢？我們或許可以從雙方談判簽約的過程中來了解。

六、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

中蘇間的歷史友誼既然不甚良好，我們自然要回顧一九四九年開始的高層友誼——勝利者的友誼。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蘇共中央委員米高揚，也是中共創黨二十八年來第一位最高層的蘇聯代表秘密訪問中共，在中蘇共雙方第一次高層會談時，毛澤東用了一天的時間說明了中共統一的決心與黨內左傾主義的錯誤路線，希望史達林不再支持蔣介石政府與王明等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⑤。顯示出毛澤東其實很在意一九四九年前史達林的政策，因為蘇聯對華的政策並不為中共所滿意。其次在新疆問題上中共提出質疑，但是蘇聯保證沒有領土野心；在蒙古問題上，毛澤東提出內外蒙合併加入中國，為蘇聯所反對；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上，中共認為是愛國條約可以保留，蘇聯認為是不平等條約可以考慮取消。此外米高揚對於毛澤東不太重視城市的無產階級分子及對蘇聯事事請示過於謙卑的態度有所保留^⑥。

中蘇共第一次的高層互訪，其實顯示出雙方外交關係可能存在的問題。中共對於蘇聯與岌岌可危的國民政府簽訂新疆協定，其實存有許多懷疑，但是對於已是蘇聯禁臠的東北，毛澤東異常地謙卑，甚至認為旅順駐軍是保護新中國必要的手段；相對於蘇聯認為共產中國已經建立，沒有必要保留不平等條約的態度來看，雙方試探對手意圖的味道相當濃厚。當然蒙古問題，毛澤東吃到了明確的閉門羹，也使蘇聯對於中共的領土野心，存有一定的防備。

一九四九年六月，毛澤東派遣劉少奇密訪莫斯科。會中除談及經濟與技術的援助外，劉少奇仍然提及了新疆問題，這方面史達林同意給予軍事上的援助，並認可了中共對新疆的統治權。中共並提出要求蘇聯派遣海軍協防青島，史達林也同意中共建國後用訪問的形式來幫忙^⑦。劉少奇在對蘇共的報告中提及了：「凡是對於中國人民及

註⑤ 徐曉天、李春隆、徐振澤著，*新中國與蘇聯的高層往來*，頁5~6。

註⑥ 參閱1960年9月22日，「米高揚就1949年1~2月的中國之行向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提交的報告」，*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3，目錄：65，案卷：606，1~17。轉引自A. M.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與中國*，頁58~72。

註⑦ *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案卷：329，1~7。轉引自A. M.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與中國*，頁99~101。

世界和平民主有利的，我們都準備加以承認。例如聯合國憲章、開羅宣言、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等。」^⑤並重新確認蒙古人民共和國民族自決的權利，贏得史達林的肯定。但是劉少奇在對蘇報告卻委婉提出修改「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三種方法。一是繼續承認不予修改；二是重新簽約；三是以政府代表換文方式，暫時維持條約的有效性。這種一邊擁護，一邊試探的手法，史達林以毛澤東來了之後再談予以延滯。

中蘇共第三次的高層互訪，已經明顯地對雙方的核心利益交手。蘇聯訝異中共態度的丕變，因為修改「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可能損及蘇聯在中國的特殊利益，也提供英美對於雅爾達體制修改的法律口實，特別是庫頁島等地的條款。所以毛史第一次的會談，史達林並不同意條約的修改，針對旅順租約僅同意實質撤軍但不贊成修改^⑥。面對史達林的拒絕，毛澤東向蘇聯駐中國大使羅申表示打算提早回國，並於是日向真理報發表訪問談話，文中表明毛澤東去留時間決定於中蘇之間的問題，而首要是現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⑦。毛澤東的動作促使史達林改變態度同意簽訂新約。

促使史達林轉變簽約的態度，並犧牲原有在中國的特殊利益是頗令人費解的，但是有些客觀的因素可能是史達林考量的重點。一是柏林危機的爆發使嚴密兩極體系迅速形成，美蘇兩大集團分別在各自勢力範圍內建立自己所喜好的政權來確保其安全感。二是美國的核子壟斷權強化了蘇聯的不安全感，積極建立可信的盟友可能比建立緩衝國來的更安全。三是二次大戰後，遠東的民族解放運動高漲，而中共是這一波中反殖民運動的代表者，壓抑中共恐怕會引起中國人的反感與合作的誠意，對於拉攏其他反殖民運動的民族解放國家可能也有負面效果^⑧。當然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六月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公開宣示向蘇聯一邊倒，與一九四九年三次高層互訪，毛澤東與其他高層領袖莫不謙卑地請求蘇聯的政策指示與教導，相信史達林對中共的效忠有所滿意的。

七、中蘇之間相互威脅的恐懼

中蘇之間既沒有深厚的革命情誼，也沒有相同革命經驗的意識型態，更沒有共同的威脅產生，中蘇共安全合作的基礎似乎不是冷戰史觀所能解釋完全的。一九四九年，中共贏得內戰的態勢底定，但是面對百廢待舉的中國，中共稱不上是一個大國，當然在與美蘇的權力對比下，中共的權力更加渺小，困擾中共的是如何保障中國的安全，而不是沉浸在勝利的喜悅。

註⑤ 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案卷：328，11~50。轉引自A. M. 列多夫斯基，頁113。

註⑥ 「毛澤東與斯大林的會晤」，黨的文獻，第二期（1996年）。轉引自徐曉天、李春隆、徐振澤著，新中國與蘇聯的高層往來，頁113~114。

註⑦ 人民日報，1950年1月3日，第版。

註⑧ 這三個觀點是由前蘇聯駐中國外交官列多夫斯基的兩個看法推演出來。A. M.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與中國，頁166。

對於一個新成立的國家，贏得各國的承認與援助是一種理性的思維^②。但是中共為何沒有採取左右逢源的策略而採取向蘇聯「一邊倒」的策略呢？而這一倒為何是從一九四九年才開始呢？這導因於史達林在國共內戰中的兩手策略。一九四九年前，蘇聯試圖在國民政府與中共間採取走鋼絲的方式，藉以奪取最佳的國家利益。一直到中共在國共內戰勝出，史達林才決心支持中共，並派遣第一位高層密使，而毛澤東也順勢而為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宣佈「一邊倒」，並在後來發表〈反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聲明〉將蘇聯視為盟友的觀點昭告天下，而同年六月三十日，更發表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強調：「這樣主動的倒，免得將來被動的倒」。^③為什麼要主動的倒？因為要安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澤東訪問蘇聯，史達林詢問毛澤東想要談什麼問題，毛澤東表示當前最重要的是保障和平的問題，史達林的回答饒富趣味^④：

談到中國，目前並不存在對中國的直接威脅，日本尚未站穩腳跟，因此不想打仗；美國雖在叫囂戰爭，但最害怕戰爭；在歐洲人們被戰爭嚇破了膽，實際上沒有誰同中國打仗。難道說金日成要進攻中國嗎？……和平取決於蘇中兩國共同的努力。……如果我們齊心協力，和平不僅可以保障五～十年，而且可以保障十～二十年，也可能更長一點時間。

史達林明顯地表達，中共所要的和平只有取決於中蘇兩國共同的努力，即中共必須與蘇聯合作才有和平可言。藉此回溯六個月前毛澤東的一邊倒，顯示出他早已看出被動倒或不倒的後果。

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毛澤東接受美國記者斯特朗的訪問反映出一種可能的情境^⑤：

美國與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裡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在各種藉口之下，在許多國家進行大規模的軍事佈置，建立軍事基地。……都是為著反對蘇聯的。……首先受到美國侵略的不是蘇聯，而是這些被建立軍事基地的國家。

這段談話顯示毛澤東清楚地認知兩極體系的影響力，倘使這段話把美國與蘇聯兩國互換，相信仍符合毛澤東的思維。因為這段話點明了來自蘇聯的兩個威脅：一是蘇

註② 張治中將軍就曾經向毛澤東建議，中共在聯合蘇聯的同時，也應當努力同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改善與保持良好關係，才符合中國利益。Chen Jian,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d China's Entry into the Korean War," Working Paper No.1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June 1992), p. 3. 轉引自張小明，「冷戰時期新中國的四次對外戰略抉擇」，劉山、薛君度主編，**中國外交新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頁3。

註③ 徐曉天、李春隆、徐振澤著，**新中國與蘇聯的高層往來**，頁44。

註④ 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案卷：329，10。轉引自A. M.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與中國**，頁140。

註⑤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http://www.mzdthought.com> (21 Dec. 2001)。

聯爲了反對美國首先侵略的不是美國而是中共；二是倘使中共成爲美國建立軍事基地的國家勢必爲蘇聯所強烈反對。三年後（一九五〇年）的毛澤東對兩極體系的互動與調整應該比先前有更深刻的認識。

首先，中共無法躲避美蘇兩國的侵略，那麼哪一個國家的侵略比較可怕？顯而易見的是綿延數千里長的國界與一洋之隔的西方國家，對於傳統陸權思考的中國而言，北方一直是歷史上威脅的夢魘！蘇聯在軍事上的攻擊遠比美國實施登陸作戰更容易也更具威脅，更何況中國戰勝日本的海權才幾年，不太容易高估海權的威脅。相對於定都北京的中共而言，往後看永遠比往前看來的可怕^⑥。

其次，倘使中共成爲美國反蘇的軍事基地，更會面臨蘇聯立即而明顯的威脅。俄羅斯人對邊界的安全感是超乎常理的，從沙俄時代，俄國與歐洲國家同樣喜歡干涉它國內政，但是它與這些歐洲強權不同的是它企圖使這些國家擁護俄國國內的制度。在沙俄的眼中，別的國家政治運動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威脅。所以二次大戰後，蘇聯不是靠所有成員國共同的國際利益或外交政策，而是靠國內實行的正統政治制度保證它在陣營內的安全。這與百年前的沙俄時代並無二致^⑦。戰後當西方國家把蘇聯視爲竭力想控制自己東、南、西面更多領土的擴張性大國，而對蘇聯本身覺得自己只是處於守勢^⑧。所以當美國在中國部署軍事力量時，就明顯地威脅到蘇聯的核心安全。一九四八年的柏林危機、一九五六年入侵匈牙利、一九六八年消滅布拉格之春，蘇聯都沒有手軟。更何況一九四九年建國之初的中共，對於期待經濟建設與軍隊復原的脆弱政權，絕對不希望將有限的資源投注在數千公里長的邊界，而遲遲無法成爲大國。

既然蘇聯比美國更具威脅，與美國結盟又會遭遇立即而明顯的蘇聯威脅，中共的外交處境比一九四〇年代的國民政府還糟。國民政府尚可執行親美親蘇的政策，並簽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由美國見證來限制蘇聯在中國的勢力，中共根本沒有任何後援，必須單獨面對蘇聯的侵略，與蘇聯合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來規範其入侵的範圍，似乎成爲無奈中理性的選項。

相對於蘇聯而言，爲何要與中共簽訂軍事同盟呢？這必須溯及到二次世界大戰蘇聯的全球戰略。二戰期間，蘇聯同美國一樣採取重歐輕亞的政策，在遠東它支持國民政府對抗日本，並給予相當的援助，中共也服膺在蘇聯的全球戰略下，表面上支持國民政府。大戰結束後，史達林對中共的成功是不具信心^⑨，所以依照雅爾達體制實現了蘇聯在中國的特殊利益，與國民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確保了蘇聯在東北、新疆、蒙古的特殊利益，也維護了沙俄時期在遠東

註⑥ 中國歷代首都的選定都有其戰略意涵，明成祖定都北京有防禦北方意味，清朝定都北京隱含進退有據的意味，而中共定都北京捨棄孫中山先生建國遺緒，不難想像它對北方的疑懼與依賴。

註⑦ 羅伯特·萊格沃爾德，「三個俄羅斯：衰弱、革命與復興」，Robert A. Pastor ed., ()，頁160。

註⑧ 同前註，pp. 169~170。

註⑨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 327.

的勢力範圍^⑦，在逐漸增溫的歐洲冷戰，維持現狀可以使蘇聯不用兩面作戰，確保其在歐洲的擴張。相對而言，中共的軍事擴張反而不是蘇聯所樂見的，節制中共支持國民政府符合蘇聯的國家利益，但是此一做法被人戲稱史達林相信國民黨勝過相信共產黨^⑧。

但是冷戰效應的擴張，反而鼓舞中共進行內戰^⑨。因為在嚴密兩極體系下，美蘇對於邊緣國家會節制其衝突行爲，以保障自身不被捲入雙方對抗的危險中，然而倘使一方介入，另一方就會非常謹慎評估是否影響其核心利益，而慎重地採取因應行爲。美國對國民政府採取聯合政府的壓力，使中共有機會在國共內戰中勝出。因為美國無法確認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又期待毛澤東是單純的土地改革者與民族主義份子，支持國民政府不僅引發中共的對抗，可能也會遭致蘇聯的介入，利用美蘇兩強對直接對抗的恐懼，使中共獲得了中國大陸的統治權，反而破壞了蘇聯在東亞的佈局。法國駐華使節就曾認爲蘇聯並不希望看到強大而統一的中國，因為它無法控制這樣的中國，蘇聯的全盤佈局是營造一個分裂而軟弱的中國^⑩。蘇聯不需要強大的國民黨，也不需要強大的共產黨，蘇聯建國以來，跟大國的合作經驗都是不好的。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當時還稱不上大國，但是衆多的人口與廣大的領土，統一在一個中央政府下，本身就是一個威脅。

蘇聯對中共的恐懼不僅是在傳統的領土安全感，也擔心它在中國的特殊利益的削弱。「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就驗證了蘇聯的擔心，蘇聯被迫削弱原有在東北與新疆的特殊利益。此外，毛澤東會不會成爲一個民族主義份子，不服從共產國際的蘇聯利益，也是蘇聯擔憂的地方。一九四四年毛澤東帶頭大肆慶祝美國國慶，讚揚美國與蘇聯同爲民主世界的雙璧^⑪，這種熱烈擁護的宣傳手段，與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宣佈向蘇聯「一邊倒」的熱情不分軒輊，看在史達林的眼裡，別有一番滋味。蘇聯更擔心二戰結束後，蘇聯損失了 15 % 的人口與 50 % 的經濟基礎建設^⑫，是否能阻止中共在經濟上向美國靠攏^⑬。所有這些恐懼都必須建立在蘇聯可掌控的範圍內才會有

註⑦ 許湘濤在分析戰後初期，蘇聯對華政策的焦點完全集中在東北問題上，對於國共內戰較少表態，顯見蘇聯當時的核心利益在維護傳統既得利益，而非中共。許湘濤，「戰後初期之中蘇關係」，頁 426。

註⑧ 尤金，「與毛澤東同志談話紀錄」，1956 年 3 月 31 日。轉引自江英，*遠東問題*，第 5 期（1994 年），前揭文，頁 576。

註⑨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 327.

註⑩ *FRUS*, vol. 8 (1949), p. 357。許湘濤分析戰後蘇聯期望中國出現三個有利於它的狀態，也有類似看法：一、一個排斥美國勢力的中國，至少必須不讓美國進入東北，以便確切而安全地保有它在東北的利益；二、一個在東北願意受它支使的傀儡地方政權，在某種程度上獨立於中國本部之外，以便爲蘇聯在東北的利益服務；三、一個因分裂而衰弱的中國，以促使蘇聯早日開始享受美、英所承諾在戰後給它的酬庸。許湘濤，「戰後初期之中蘇關係」，頁 413。

註⑪ 楊玉經，「祝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門爭節日」，*解放日報*，1944 年 7 月 4 日，第版。

註⑫ 羅伯特·萊格沃爾德，頁 169。

註⑬ 美國認爲中共上台後所面臨的經濟與管理問題，會使得中共在各領域的威信受到破壞，而美國雄厚的資本與先進的管理技術，有助於中共內部問題的解決，也是美國影響中共政策演化的秘密武器。*FRUS*, vol. 9 (1949), pp. 491 ~ 495.

安全感，一個相互威脅且受條約規範的軍事同盟成爲雙方安全的保證。

除了相互的恐懼促成中蘇之間的合作，當然也有許多中外學者提出中蘇共合作的理由^⑦。但是這些理由都很難解釋爲什麼「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歷經中蘇交惡，甚至兵戎相見，最後到了中共親美反蘇的階段，雙方還是不敢片面廢除本條約，一直到一九八〇年條約期滿才自動廢除^⑧。這說明了本條約的真正本質源自於中蘇之間相互的恐懼，而非其他短暫的表象因素。

八、結 論

一九五〇年中蘇安全合作的經驗頗爲特殊。它的合作基礎不是源於意識型態的背景，也不是共同威脅下的同盟關係，更非冷戰史觀的歷史必然巧合。一九五〇年代中蘇安全合作可能源自於中蘇雙方的恐懼。由於蘇聯是二次大戰後東亞體系的挑戰者，中共選擇追隨蘇聯，試圖從西方國家控制國府下的中國解脫，進而尋求一個共產世界的成果分享。對中共的利益而言，他選擇了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也符合其修正現狀的利益。同樣地，由於加入危險的一方，爲了獲取蘇聯的善意，毛澤東認爲一邊倒的表現與承諾還是不夠的，蘇聯與中國的關係必須用法律條文固定下來，必須明確中蘇之間是我要一邊倒，而你又求之不得這樣一種關係^⑨。這種將國家安全建立在危險強權的善意上，是一種無奈又理性的抉擇。由於權力的不足，蘇聯的威脅與西方國家不可靠的援助，促使中共願意付出與表演令蘇聯滿意的一種關係；同樣地由於蘇聯對中共領導人可能的疑懼，與共產中國在遠東地區可能扮演的角色，促使蘇聯願意與中共分享權力，藉以控制中共來換取服膺蘇聯的政策。當然恐懼中共的崛起也使得蘇聯對中共的援助一直比不上東歐，甚至在韓戰時期要求中共代蘇聯執行代理戰爭，中共換

註⑦ Helmut G. Callis認爲北京採取「一邊倒」有五個主要原因：（1）一個新的共黨國家若牽涉到戰爭時可藉此保護本身；（2）可從蘇聯的援助中建立一個現代化的陸海空武力；（3）可經由蘇聯吸收西方的科學與技術；（4）在本身的工業化計畫中能得助於蘇聯的行動合作；（5）確信自身在蘇聯的支持下能重獲舊帝國時期所喪失的邊境影響力。請參閱 Helmut G. Callis, *China: Confucian and Communist* (N. Y.: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59), p. 385。除此之外尚有可能原因爲：意識形態必須與美國對抗所以與蘇聯合作，毛澤東爲鞏固黨內領導地位籠絡親蘇派，蘇聯強大的武力本身就是一種威脅，美國與國民黨合作的經驗使北京無法相信美國會全力支援北京所面臨的威脅。請參閱 J. K. Fairbank & R. Macfarquhar eds., 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頁 68、282~283。

註⑧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一日，蘇聯與南斯拉夫簽訂了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條約期限 20 年，雙方同意給予軍事上的援助，不得參與反對的聯盟，相互尊重主權，不得干涉內政。一九四八年蘇聯與南斯拉夫關係破裂條約終止，由此證諸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可顯現出相互威脅的絕對因素。方連慶、劉金質、王炳元主編，*戰後國際關係史（上）*，頁 98~99。

註⑨ 徐曉天、李春隆、徐振澤著，*新蘇聯與中國的高層往來*，頁 154。

取安全的代價不可謂不大。

相互威脅的觀點來看一九五〇年代的中蘇安全合作，的確得出不少有趣的觀察，也相當程度地吻合史實，儘管以意識型態與共同威脅為主的冷戰史觀，仍具有部份解釋力，但是相互威脅的解釋力應該可以開啓對中蘇安全合作的新認知。

* * *

(收件：93年5月12日，接受：93年6月29日)

Security in Mutual Threat— the Observation of Sino-Soviet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1950

Hsiang-hua Chou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of the 1950s from a mutual threat perspective. Reflecting upon cold war history,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notions of ideology and common threat in a 1950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view of mutual threat explains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of the 1950s.

Keyword: mutual threat; security cooperation; Sino-Soviet relation

參.考文獻

- Andrew J. Nathan & Robert S. Ross, 何大明譯,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長城與空城計) (台北: 麥田出版社, 1998年)。
- A. M. 列多夫斯基, 陳春華、劉存寬譯, *斯大林與中國* (北京: 新華出版社, 2001年)。
- J. K. Fairbank & R. Macfarquhar 主編, 王建朗等譯,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92年)。
- John King Fairbank 著, 張理京譯, *美國與中國*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1年)。
- John S. Service, 王益等譯, *美國對華政策* (The American Papers: Som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US-China Relations)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院, 1989年)。
- Michel Oksenberg 著, 胡利平、楊韶琴譯, 「中國: 走向世界舞台的曲折道路」, 在 *世紀之旅: 七大國百年外交風雲* (A Century's Journey: How the Great Powers Shape the World)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1年)。
- 方連慶、劉金質、王炳元主編, *戰後國際關係史(1945-1995)*, 上册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年)。
- 尤·米·加列諾維奇, *斯大林與毛澤東* (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9年)。
- 尹慶耀, *中共的統戰外交* (台北: 幼獅文化出版社, 1984年)。
- 林利民, *遏制中國—朝鮮戰爭與中美關係* (北京: 時事出版社, 2000年)。
- 林孟熹, *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 (北京: 新華出版社, 2001年)。
- 肖元愷, *百年之結—美國與中國台灣地區關係的歷史透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年)。
- 吳冷西, *十年論戰*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9年)。
- 胡喬木,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年)。
- 姜長斌、Robert Ross 主編, *從對峙走向和緩* (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0年)。
- 徐曉天、李春隆、徐振澤著, *新中國與蘇聯的高層往來* (吉林: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年)。
- 孫健, *中國經濟通史(下卷)*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 2000年)。
- 袁南生, *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下冊)* (湖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
- 張小明, *中國外交新論*, 「冷戰時期新中國的四次對外戰略抉擇」, 劉山、薛君度主編 (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7年)。
- 梁敬鎔譯, *馬歇爾使華報告書簽註*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4年)。
- 許湘濤, 「戰後初期之中蘇關係(1945年8月至1946年8月)」, 張玉法主編, *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十輯* (台北: 聯經出版社, 1982年)。
- 楊玉經, *中國人的美國觀* (上海: 復旦大學, 1997年)。
- 華慶昭, *從雅爾塔到板門店—美國與中、蘇、英: 1945-1953*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

院出版社，1992年）。

對外貿易部編，**對外貿易論文選集**（北京：中國財政經濟，1955年）。

劉山、薛君度主編，**中國外交新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

關中，「戰時國共商談」，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十輯**（台北：聯經出版社，1985年）。

謝益顯主編，**中國當代外交史 1949-199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

戴萬欽，**中國由一統到分割—美國杜魯門政府之對策**（台北：時英出版社，2000年）。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http://www.mzdthought.com/mxxx.htm>（21 Dec 2001）。

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83。

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3，目錄：65，案卷：606，1-17。

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39，目錄：1，案卷：31，40-44。

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案卷：329，1-7。

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案卷：328，11-50。

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案卷：329，10。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47.

Chen Jian,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d China's Entry into the Korean War," *Working Paper No.1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June 1992), p. 3.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 32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vol. 8 (1948);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pp. 146~155, pp. 356~357.

FRUS, vol. 9 (1949), p. 22, pp. 474~475, pp. 491~495, p. 1392.

Harry Harding,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oblem of Communism* (March/April, 1983), p. 2.

Helmut G. Callis, *China: Confucian and Communist* (N.Y.: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59), p. 385.

Inis L. Claude, Jr.,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pp. 42~51, p. 66.

Paul Schroeder,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Summer 1994), pp. 116~117.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Summer 1994), pp. 79~81.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7, pp. 21 ~ 26, pp. 29 ~ 30, p. 59.

William Whitney Stueck, Jr.,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 1947-1950*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pp. 120 ~ 121.

